

印度绿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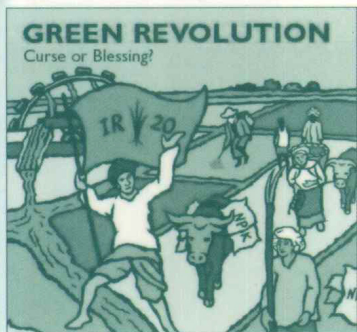
现代化论坛

发展、停滞和转变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ia's Green Revolution: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Transi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王立新/著

印度绿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学：

王立新／著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ia's Green Revolution: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Transition

现代化论坛

发展、停滞和转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绿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停滞和转变/王立新
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现代化论坛)

ISBN 978 - 7 - 5097 - 2085 - 1

I. ①印… II. ①王… III. ①绿色革命 - 政治经济学 -
研究 - 印度 IV. ①F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4610 号

现代化论坛

印度绿色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停滞和转变

著 者 / 王立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经理 / 宋培军

责任编辑 / 宋培军

责任校对 / 高建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1.8

字 数 / 374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085 - 1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1

第二节 印度农业中的资本形成	86
第三节 印度农业现代化的有限性	121
第三章 独特的农业转型	13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农业转型概念： 内在的和外在的	135
第二节 印度的农业转型：生计农业的现代化	142
第四章 印度农业生产组织及其制度变迁 ——对印度农业转型的一种诠释	187
第一节 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农业生产组织和 生产方式	187
第二节 印度农业生产组织的原生形态	204
第三节 近代以来印度农业生产组织制度结构的 嬗变	231
第五章 结构转型的停滞	273
第一节 生计农业转型中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 过程	273
第二节 绿色革命时期的工业增长过程	293
第三节 结构转型的停滞及其社会政治后果	317
结论 没有发展的转变：后农民社会的到来？	330
附表	343
表1 2000/2001 年度印度粮食主产邦粮食 播种面积、单产量和总产量	343

表 2	1991/1992 年度至 2000/2001 年度印度政府 在各水稻/小麦主产邦购买粮食数量	345
表 3	1966 ~ 1982 年印度农业部门 MSR 指数变化	346
表 4	印度和中国当代农业概况比较	346
附文 1	印度农民政治文化变迁和现代民族运动的兴起	348
附文 2	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从工业主义到重农主义	364
附文 3	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现实：绿色革命期间 印度旁遮普邦的农业发展	383
引用文献		411
后 记		427

导 论

20 世纪 60 年代，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以使用高产作物品种（HYV）种子和化肥为标志的农业技术变革，习惯上称之为“绿色革命”。从这些国家开始满怀信心地进行绿色革命到现在，历史老人已悠悠地度过了 40 多个春秋。在 2004 年 1 月《农民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塔里克·尼阿兹写道：“印度次大陆上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绿色革命再次成为学术和政策讨论的题目，而它的发起人诺曼·布劳格博士也正在被一些人忧郁地当作一个‘被遗忘了的英雄’加以纪念。”（Niazi, 2004: 242）

如同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那样，印度也被看作是“绿色革命的亮点”（Niazi, 2004: 243）。那么，在这个作为绿色革命亮点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绿色革命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如果说囿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们在过去还不大容易对这个问题作出系统而全面的解析，从而差不多总是局限于考察绿色革命和印度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个或某些面向之间的关系的的话，那么，现在，当绿色革命对该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已完全显现，从而使我们拥有从后绿色革命时代去审视前一个时代的便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也应该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和切实的回答了。

一 为什么要研究绿色革命

当 2004 年 8 月第 28 届雅典奥运会让全世界的人们想起希腊是一个盛产神话的古老国度的时候，三个月前在印度举行的第 14 届议会选举也让人们看到印度是一个盛产另类神话的现代国度：政治神话。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距这届大选开始仅仅一个月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人瓦杰帕伊总理还在《今日印度》论坛上慷慨陈词，大谈“建设一个印度世纪”，对“印度大放光芒”显得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然而，几乎让所有政治观察家跌破眼镜的是，这次印度人民院大选的结果却是把自以为政绩卓著从而迫不及待地举行新一届议会大选的印度人民党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丢进了黑暗的政治深渊。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印度人民党及其政治盟友悲惨地输掉了这次选举，而被人们普遍认为已经“没落”的印度国大党（INC）及其盟友却奇迹般地赢得了这次大选！

在上次即 1999 年举行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一党就赢得了人民院 545 个议席中的 182 席，再加上其盟党获得的 174 席，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共获得了 356 个人民院议席，从而稳稳地掌握了人民院的多数席位。相比之下，老牌的印度国大党仅获得了 114 个议席，即便加上其政治盟友获得的议席数，国大党掌握的议席总数也不过 140 多席，远低于组阁所需的超半席位数。然而，时隔还不到 5 年，印度一度被逆转了的政治乾坤似乎又开始翻转过来。在 2004 年 4、5 月份举行的第 14 届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的人民院议席数陡降至 138 席，而国大党获得的议席数则大幅度地增加到 145 席；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治联盟获得的议席数更降至 185 席，比上届大选几乎减少了一半，而国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获得的议席数增加到 217 席，几乎增加了一半。印度国大党及其政治联盟所取得的选举胜利使得印度国大党终在阔别执政地位 8 年之后再次组阁。2004 年 5 月 22 日，曼莫汉·辛格正式组成“联合进步联盟”

政府。如果说印度人民党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崛起曾令人们有点看不懂的话，那么，新千年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印度国大党的“东山再起”则再次让人们有些迷惑不解。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宰了印度政治舞台上各政党的沉浮荣辱呢？这是每一个关注印度当代政治发展的人都渴望立即求得答案的问题。对此，还在这次大选结果尚未正式公布的时候，路透社记者玛丽亚·亚伯拉罕就在一篇题为《BJP 为在“印度大放光芒”中被抛入黑暗的农民付出沉重代价》的时评中，给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提示。还是让我们首先随着她的娓娓道来去看看其时正在印度大地上发生的“故事”吧：

苏莱什·瓦尔萨是印度西部的一个贫苦农夫。炎炎烈日下，他无精打采地在他那块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除草。在他身旁，一辆辆崭新的汽车嘶鸣着疾驶而过。

在几码远的地方，他的几个孩子赤身裸体，在他的小茅屋外面奔跑嬉戏。他的小茅屋距离南面印度繁华的金融中心——孟买虽只有 70 公里的路程，却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BJP 统治这个国家已有五年了。他们说印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瓦尔萨愤怒地说。他今年 22 岁，所得收入仅够一家人糊口。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为我们这样的贫苦农夫做些事情……哪怕是一丁点事情呢？”

那种愤怒的声音响彻在这个国家数百万计的农场上。那里是大多数印度人生活的地方。在星期四，正是这种愤怒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总理失去了看似稳操胜券的全国大选。

在农村，许多印度人心怀怨恨。他们说，经济改革和经济繁荣有利于城市中产阶级，却把他们置于为了一家温饱而苦苦挣扎的境地，更不用说梦想得到汽车和电脑了。

从多数邦运来的选票统计机显示，瓦杰帕伊的印度人民

党领导的联盟令人吃惊地输给了反对党——国大党，后者攻击他的“印度大放光芒”运动只是一场印度精英们自鸣得意的喧嚣。

“印度在哪儿大放光芒？当然不是这里，”距离孟买北部110公里的高瓦德村中的一个农夫甘帕特·帕蒂尔这样说。

“BJP只是使富人变得更富，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他说，“而国大党总是和穷人站在一起。”

怨恨

去年，北印度有着一个风调雨顺的雨季，但是农业——这个部门大约支持了该国10亿人口中7亿人的生计，构成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依然是一个经常颗粒无收的高风险行业。

城市中发财致富的传奇、消费品的琳琅满目和几百万人的出国度假只是在（农村人的）创伤之上添加了难堪的羞辱。

“我们没有水，没有电，但我听说孟买是一个有着大汽车和崭新而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的大都市，”瓦尔萨说。他既不能读，又不能写。

他从来都没有去过孟买，因为他付不起还不到区区一元钱的车费。他是邻近村子里的一个建筑工人，每月仅能勉强挣得1000卢比。

然而，瓦尔萨比其他一些印度农民的景象还是略为好些。他拥有一小块儿土地，依靠这块儿土地他能够生产足够的水稻，使他的妻子、孩子和父母至少能够（每天）吃上一顿饭。

但是生活改善的前景是暗淡的，他的作物的收成也依然严重依赖季风雨的状况。

Y. S. R. 雷迪将在周五宣誓就任安德拉邦——一个新兴的信息技术中心——的首席部长。当他在本周早些时候谈到浩大的农村抗争的时候，他概略描述了上述情景。

“这是人民愤怒的表现。这是一场静静的革命，”他说。

在钱德拉巴布·奈杜未对这个遭受了严重旱灾的农业大邦的农村穷人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后，雷迪在周二击败了这位和 BJP 结盟的前首席部长。

批评家们说，奈杜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该邦特别是首府海得拉巴德建设为该国最好的技术中心之一。

看来，他并不是唯一看错了方向的人。[Abraham, 2004]

是呀，当现代主义的西方学者们热衷于谈论“印度民主制的成功”、“正在崛起的大国”、奇迹般迅速成长的新经济和中产阶级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等令人着迷的“现代化”标志时，他们看来确实忽视了印度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直到最近，印度社会还是一个十足的农业社会。据世界银行《2000 年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数字，1998 年印度三个产业部门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依次为：农业 29%，工业 25%，服务业 46%（世界银行，2000：185）。不用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比较，也不用与战后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比较，仅仅与它的两个同样不发达的第三世界邻居——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相比，印度的这种产业结构也无可辩驳地表明印度依旧是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

表 0-1 1998 年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三大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孟加拉国	22	28	50
巴基斯坦	26	25	49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第 184、185 页。

另据印度政府 2001 年人口普查，在印度 1027015247 名总人口中，农村人口为 741660293 人，占全部人口的 72.22%，而在印度的 402234724 名工作人口中，农业部门中的工作人口合计

234088181 人，也占到全部工作人口的 58.20%（Census of India 2001, Tab. 1.8 & 00-009）。

无论政治评论家们对这次印度大选作出怎样的分析，也无论他们是否同意那位路透社记者的描述和见解，这次大选的结果确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在印度这样的现代农业社会中，究竟谁是猴子，谁是老虎。它给我们的一个需要时刻铭记在心的启示是，我们如果想更加准确地理解当代印度社会的政治生态及其发展趋势，就不能把我们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民主化之类为西方现代化论者所津津乐道的议题上，而必须把我们的视野扩大到印度的农业社会，必须把我们的关注点转向对印度农业社会发展的研究。毋庸置疑，当一个社会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农业社会而非工业社会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正确理解只能通过对这个社会的农业发展过程本身的详尽研究才能做到，而绿色革命构成了印度独立后农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二 绿色革命简单概念

“绿色革命”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主任威廉·高德于 1968 年首次使用的。就在那一年的华盛顿国际发展协会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绿色革命：成就和问题》的演说。根据基思·格里芬的说法，“绿色革命”常用来指称两种不同的事情。一些学者用它来指欠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广泛转型、食物短缺状况的缓解、营养不良状况的改善以及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的减弱等。另一些学者则用它来指某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特别是水稻和小麦高产品种的培育。在后一种情况下，宣传家的词汇表中有时添加了另一个令人误解的词条：奇迹稻。那些在狭义上使用“绿色革命”这一术语的人并不一定希望人们觉得他们暗示发生了广泛的农业转型，但是在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趋势，即那些相信粮食产量已经获得显著提高的学者也相信第三世界的农村问题正在因此获得解决（Griffin，

1979: 2-3)。

不管怎么说,历史地看,绿色革命代表了二战以后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一种新的农业变迁过程。根据埃斯特·博塞拉普的农业变迁理论(Boserup, 1993 [c1965]),传统的农业变迁是一个农业集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包含着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另一方面是劳动投入的集约化。这样,传统的农业变迁就表现为一个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单位面积土地上劳动投入不断增加和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不断提高的过程。从20~25年一作的“森林休耕制”(刀耕火种式农业)到6~10年一作的“灌木休耕法”、三年两作的“短期休耕法”,再到一年一作法和人口稠密的农民经济中的复种制,传统农业变迁过程中耕作制度的这种演进既表示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也包括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的集约化。这个过程的终极趋势是,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人口对土地压力的增大和劳动集约度的不断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迟早会呈现出递减倾向,结果就是格尔茨所谓的“农业内卷”(即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情况)。在这种农业演化过程中,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那种促进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增加的技术变革,而非偏向增加资本投入的技术变革。例如,传统农业中施(有机)肥技术进步和水利灌溉设施改善的首要效果,就是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投入,即农业生产的劳动集约度。

与这种传统农业变迁中的技术革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绿色革命代表了一种新的农业技术革新,它倾向于增加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提高农业的资本集约度。正像博塞拉普所说的那样,“过去,发展中国家应付人口增长的主导方式是利用增加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利用和家畜饲养的集约度……但是现在,在这种应付人口压力的传统方式之外,出现了另外一种扩大产出的方式。这种新方式的出现,是由于工业的和科学的投入品(如化肥、杀虫剂、改良种子、拖拉机、现代灌溉设施和推广服务等)在农业中的应用”。(Boserup, 1975: 262) 这些“工业的和科学的投入

品”就是现代农业中使用的资本品。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绿色革命虽然基本上只局限于应用生物技术方面的革新（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但还是大大促进了这些国家或地区农业资本化的发展。诚然，高产品种种子的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但是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高产品种种子本身就是资本品，因为和传统作物种子不同，高产品种种子是作为商品化的生产资料加入农业生产过程的，它们和其他资本品一样是总资本投入中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由于高产品种种子的增产效果取决于所投入的其他相关现代生产要素（特别是水和化肥等）的充裕度，以高产作物品种技术为核心的绿色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大大增加在现代水利设施（如管井和水泵）和化肥等方面的资本投入。因而，总的来说，即便没有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相伴随，绿色革命依然是一种偏向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技术变革，而作为一种农业变迁过程，绿色革命则意味着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向现代资本密集型农业的转变。

三 研究状况

不管我们给绿色革命下一个什么样的定义，绿色革命本身首先只是二战后在农业部门中出现的一种新农业技术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不管这种农业技术变革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绿色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适宜对象，而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领域。绿色革命之所以成为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换言之，只是由于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紧密相关性，绿色革命才成为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家（有别于自然和技术科学家）在对绿色革命的研究中一般都采取反思的态度，即从绿色革命与经济、社会或政治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和认识绿色革命。

这样，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印度绿色革命的研究就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印度绿色革命本身为研究对象，在社会科学的视野下分析印度绿色革命的起源、进展和前景等问题；另一类仅把绿色革命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的一般物质基础来看待，例如对印度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探讨就属于这类研究路径。当然，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这两种路径或多或少是混合在一起的。

查托巴德亚对印度绿色革命的研究无疑属于第一类研究。在《印度农业：失败的绿色革命》一文中，查托巴德亚完全是把绿色革命作为印度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特殊技术变革来评价的。在该文中，他规定他的研究目的是“要从播种面积、粮食生产、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口粮食获得量等变数来考察最近一二十年印度农业经济的成败”（查托巴德亚，1985：9）。针对绿色革命推动了印度农业生产发展的看法，查托巴德亚认为“对种植面积、单产、人均粮食获得量等有关资料所作的仔细分析说明，印度农业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某些不同的趋势”，“与独立前相比，印度农业在1949/1950年度到1970/1971年度期间无疑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在绿色革命以后的时期（1967/1968年度以来）增长率却趋于下降。非粮食作物产量（增长率）下降的程度比粮食作物更为剧烈”（查托巴德亚，1985：9）。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七十年代印度农村的所谓绿色革命并没有改善农业生产状况。七十年代后期尽管遭到自然灾害，粮食生产的增长没有减慢。但是在七十年代早期，虽然年成不错，粮食生产增长率却有递减趋势。总的说来，绿色革命以来农业总增长率似乎不能令人满意。”（查托巴德亚，1985：11-12）

克里斯托弗·贝克在《青蛙和农场主：印度的绿色革命及其朦胧的过去》一文中对印度绿色革命的研究则是立足于印度农业的长时段发展，力图探讨绿色革命在印度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在该文中，贝克首先指出了近来对绿色革命的两种消极评价：一种认为绿色革命只是出现于少数地区和生产制度上。在印度，绿

色革命在小麦生产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水稻生产上的效果则是可疑的。印度的绿色革命也只是在被选定实施集约耕作计划的地区才扎下了根，而在其他地区则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绿色革命”。根据这种观点，整个说来，印度次大陆上的农业增长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高，因而绿色革命更多地只是神话，而不是现实（Baker, 1984: 37）。

针对上述对绿色革命的批评，贝克在批评 19 世纪关于印度历史的“气垫船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绿色革命在印度农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应该从奇特的零星增长的长期历史模式角度去评价绿色革命新技术的特别不均衡的影响。换言之，绿色革命不是从停滞转向变革的一次突然飞跃，变革的影响极不均衡这个事实是十分符合以往的模式。从长时段来看，印度农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只毫无希望的懒惰的蟾蜍，它更像一群昏昏欲睡的青蛙，其中每一只在经过长期的沉寂后都可能会突然向前大大跃进。其次，贝克还认为，绿色革命不应该被看作在本质上是印度从外面输入的。绿色革命的鼓吹者倾向于认为绿色革命是国际合作和现代科学的一个巨大成就，而批评者则认为绿色革命是近来美国百万富翁的代理人的一个邪恶的阴谋。当然，重要的种子来自墨西哥和菲律宾，资金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另外两个对绿色革命的成功极其重要的因素完全是内生的——一是对这种技术进步的需求（以及使用新技术的意愿），二是分配货物的组织能力。关于第一点，到 20 世纪中期显然已经产生了急切盼望得到新技术的农场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热情地采用市场或政府农业部门提供给他们各种新作物和新种子，促使政府向他们提供灌溉资助，在具有技术和经济可行性时修建水井，以及抢购水泵等（Baker, 1984: 46-47）。这是关于印度绿色革命发生的内生学观点。

此外，针对印度绿色革命中的不平等问题，贝克认为人们无须对这个问题大惊小怪。在他看来，这是“老问题而不是新问

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绿色革命过程中印度农业向资本主义合理性及其全部祸害（积累、再积累）转变的趋势，而在于向不劳而获的租佃制（寄生、寄生）转变的趋势（Baker, 1984: 49）。最后，贝克还认为技术因素并不是决定印度绿色革命发生区域的决定性因素，地方的社会结构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Baker, 1984: 51）。

在《印度农业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第八章“绿色革命战略”中，阿绍克·鲁德拉对印度绿色革命的研究初看起来属于第一范畴，但实际上已经属于第二范畴，因为对他来说，研究绿色革命就是研究印度政府的新农业战略，对绿色革命的考察和评估就是对印度政府新农业战略的考察和评估。在“绿色革命战略”这一章中，鲁德拉开宗明义地写道：

在印度，“绿色革命”（或“新农业”、“新技术”等）这个名称所代表的是印度农业状况所发生的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些状况是印度政府有意识实行的某种战略的直接后果。虽然我国缺少任何一种整体经济政策框架，特别是缺少任何一种收入政策框架，虽然我国的工业政策充满矛盾，但是，我们确实有一套协调一致的、前后连贯的农业政策。
[Rudra, 1992: 153]

鲁德拉认为这种政策就是印度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开始主张的那种政策，这种政策的哲学基础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印度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制度安排，而不是技术因素（Rudra, 1992: 160）。因而，印度独立后强调通过制度改革发展农业生产能力。

但是，鲁德拉又同时认为印度自上而下的农业发展战略完全是外来品。他说：“我们的工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工业家和官僚的创造物，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外来影响。然而，我们的农业政策百分之百地是外国政策顾问特别是美国政策